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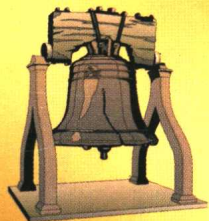
东方文化与现代社会

之二

与
现
代
社
会

罗传芳 主编

道教文化



伏尔泰说过，当一个人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他必须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因为“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

沈阳出版社

·东方文化与现代社会丛书之二

丛书总策划 徐远和 信 群

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

罗传芳 主编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罗传芳主编.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1.7

(东方文化与现代社会/徐远和, 信群主编)

ISBN 7-5441-1716-2

I. 道… II. 罗… III. 道教—研究 IV. B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146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 110011)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4.875

印数: 1-2000 册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信 群 田雪峰
杨敏诚 萧大勇

责任校对: 钟 仁

封面设计: 高 禾

版式设计: 张 辉

定价: 28.00 元

2006/01

《东方文化与现代社会》

丛书总序

伏尔泰说过，当一个人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他必然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因为“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东方曾是印度、巴比伦、埃及和中国四大文明以及印度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的发祥地。东方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蕴涵丰富，而且在中世纪传入西欧，曾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光焰下，东方文化黯淡了。然而，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半个世纪以来，东方在重新崛起，东方文化的价值也与日俱增。当人们展望21世纪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时，已不能不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东方，期盼着东方文化再创新辉煌。

如今，不少东方学人正将这份期盼化为行动，切切实实地开展东方文化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为团结、联合更多的学人，发挥群体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学术群体，成立两年多来，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组织力量从事东方文化的课题研究，召开东方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编辑出版学术著作等等，做出了值得赞赏的成绩。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始终将活动重点放在学术研究方面，不仅重视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理论探讨，而且关注东方社会现

实中的热点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贴近社会，贴近群众。继编辑出版《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月亮国的智慧》、《风流与和魂》、《信仰与理性》、《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后，最近又将推出《东方文化与现代社会》丛书（《儒学与现代社会》、《道教与现代社会》、《伊斯兰文化与现代社会》）。这两套丛书一方面展示了当代学术界研究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中日朝韩越等东方文化的最新成果，另方面也凸显了东方文化的无限深邃和巨大魅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弘扬东方文化的一种尝试，还特地编辑出版了大型图册《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精品大观》，汇集点评了嘉德等六大拍卖公司近千件上乘拍品图片，被誉这“企业、文化和出版界结合”、“企业向文化延伸、文化向企业寻求合作”的好形式。

东方文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有很多课题至今无人问津，而社会对东方文化的需求却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亟待开展更大规模与更深层次的学术探索，大力发掘、整理东方文化典籍，穷究、把握东方文化精义，进一步弘扬与提升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前景光明，东方学人也可以大有作为。让我们共勉！

沈康

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在道教（代序）

卿希泰^①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互补的文化，其中，儒、释、道三教实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提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对鲁迅先生的这个科学论断在具体理解上虽然尚不一致，但它说明了道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根据这个论断，我们也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

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方面，道教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份，成为它的思想渊源的一部分。这里可以举几个主要方面：

^①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 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一，道家思想。道家与道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先秦道家，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哲学派别，而道教乃是东汉形成的一种宗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是，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道家哲学乃是道教的理论基础之一。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把它规定为教徒们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其界层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庄子·大宗师》更说“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这种以“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以长生久视，成为神仙的思想，为后来道教所吸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它从宗教的角度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灵而有信”（《坐忘论》），“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妙门由起序》），并与神秘化了的元气学说结合起来，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成玄英《道德真经玄德义疏》，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同上），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道教还把老子看成是“道”的化身，《老子想尔注》宣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其后《混元皇帝圣纪》又说：“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化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也。”于是，老子与道在道教中便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说明哲学家老子与哲学范畴的“道”，在道教

中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它的核心，其他的道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式，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的。它之所以命名为“道教”，也与它的基本信仰是“道”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道教产生时起，研究老庄思想的，相当多的人都是道教徒，阐述和注释老庄的许多宝贵著作，都集中在道教典籍的丛书《道藏》之中。老子及其学说之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与道教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的。正因为道教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文化，它们之间具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人们习惯上常常把道教也称为道家。

第二，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这种伦理纲常的核心是“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二者合起来统称“纲常”。这种伦理纲常思想，也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道教在宣扬这种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和它的长生成仙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实际效用比儒家更大。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天师教诫科经》说：诸欲修道者，务必“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道教的许多戒律，都有不少类似的规定。特别是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里，还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太平经合校》第135页），而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甚为深远。《太平经》还将这种伦理道德规范与

它的承负说联系起来。它认为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弟子当顺。如果“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同上第405-406页）又说：“子不教，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同上第406页）由此可见，道教不仅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吸收过来，而且把它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发挥更大的特殊作用。

第三，墨家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过：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章氏丛书检经》第三）。墨子所提倡的尊天明鬼思想被道教吸收，无须多说。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倡自食其力和互助互利，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影响也很明显。道教有些神仙方技和变化方术，也依托墨子。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记有《墨子丹法》，《遐览》篇记有“变化之术”的《墨子五行记》，称“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葛洪还把墨子列入《神仙传》，说他外法经典，内修道术，精思道法，想像神仙，后得神人授书，“乃得地位”。可见墨子在道教信仰中的吸引力是不小的。过去许多学者认为墨家学说在秦汉以后就中绝了，失传了。实际上，它并未中绝，也并未完全失传。到那里去了呢？被道教吸收进去了，它的许多内容，特别是尊天、明鬼之类的宗教内容，在被道教所吸收以后，仍在社会上流传。

第四，《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易》本来是一种

卜筮之书，其占卜之术，为后来的道教所承袭。《易经》里由卦象的推演，其内容蕴含着变化的观念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里作了很好的发挥。宋代学者邵雍就说过：“老子知《易》之本。”（见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九）说明道家 and 《易》早有密切关系。东汉时，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而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乃是假《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来论述修仙的方法，对后世道教的影响甚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后，以《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阐发道教的内外丹法的道教学者，更是络绎不绝。

第五，讖纬之学。阴阳五行思想起于先秦。汉代从董仲舒起，开始以这种思想解经，逐步形成讖纬之学。讖纬思想有许多为道教所吸取。道书中，有些是直接从纬书搬用过来，连文字都未作多少改变。如《河图纪命符》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又人身中有三尸……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这种神秘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被道书所引用。其他如《龙鱼河图》中关于天人相互感应和呼神（五岳神、四海河神、五官神）防病却鬼，《河图稽耀钩》与《河图帝览嬉》中关于星象预示吉凶之说，以及《河图括地象》与《尚书帝验期》中关于昆仑山是圣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为赐授仙经，指引修道之神等等，皆为道教所承袭。

第六，古代鬼神思想。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将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视为神灵，并对它们进行祭祀和祈祷等崇拜活动，由此逐步形成了天神、地祇和人鬼

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不断将许多神灵纳入道教的神灵之中，成为道教崇奉的神灵。

第七，巫术和神仙方术。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能交通鬼神。这种依仗巫术祈福禳灾的方式遂为道教所吸收。战国以后神仙方术渐盛，神仙思想在《庄子》和《楚辞》里已屡见不鲜。稍后，在燕齐一带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的方士，利用战国时齐人邹衍术的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他们的方术，从而形成了所谓神仙家，即方仙道。传说崇尚方仙道的宋毋忌、郑伯侨等都向往神仙，“形解销化，依于神鬼之事”。以后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演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方术士亦逐渐演化为道士。

第八，黄老思想。黄老学说起于稷下道家，他们同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道家创始人。至汉初，文、景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治黄老之学者蜂起。黄老思想包含很多神秘主义的因素；加以治黄老之学者中，本来就许多方士，他们以神仙长生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对这些因素作出宗教性的解释，使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而向神仙方术的方向发展。至东汉，进一步将黄帝、老子神秘化，又由着重尊崇黄帝，转而推崇神化后的老子，逐渐形成奉老子为神明的黄老道，并与方仙道逐渐合流，成为道教的前身。当时道教的一个主要派别太平道，其创始人张角，最初就是属于黄老道的信徒。

以上事实，说明了道教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它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文化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马端临称它是“杂而多端”。唯其如此，所以许多古代的文化思想，都汇集在道教之中，并借道教的经典留存下来，得以流传至今。这便是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的

根柢在道教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道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又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学术思想的领域来看，道教在历史上产生过许多著名学者，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道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儒释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相互排斥，互相斗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融合与发展。唐代道教学者司马承祯所倡导的守静去欲理论，本身既吸收了儒释的思想，后来又为宋儒所吸取。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学说，都渊源于道士陈搏。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衍”为《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阴符经》也作过考订，当自谓“清夜眠斋宇，终朝读道书”，足见他对研读道教经典的勤苦用心。正是由于他把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守静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哲学思想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可以说，宋明理学乃是道、儒、释三家思想的结晶。所以，不了解道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很难认识中国学术思想的全貌，弄清楚它的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第二，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也有非常深刻而突出的影响。道教信仰的理想，是长生成仙。这种神仙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中，成

为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古代以道教神仙为题材的作品，充满于诗、词、曲、赋、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之中，数量甚多，作者亦不少。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是抒写神仙漫游之情的一种诗歌，以郭璞为著名，在《文选》中被列为文学体裁之一。唐代道教兴盛，反映在诗歌中，以神仙思想为题材的作品相当多，成为唐代诗歌门类之一。伟大诗人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其部分诗作堪称神仙诗门的代表，人们称他为“诗仙”，他也以“谪仙人”自居。李白晚年，就北海高天师受道箓于齐州紫极宫，正式成为道士。在宋代词作当中，反映道教活动题材的作品也是大量的，而且不少规定作词体制的词牌，其得名即来源于道教的有关神仙故事。例如，《解佩令》因江妃二女解佩与郭交甫的故事而得名；《惜分钗》因道士杨通幽于蓬莱仙山见杨贵妃，取回金钗之半给唐明皇的故事而得名。在元代戏曲当中，反映道教神仙人物的戏曲特别突出，文学史家称之为“道剧”。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分元曲为十二种，“神仙道化戏”为其中之一，元代著名戏曲家马致远被称为“万花丛里马神仙”。明代的神魔小说中，属于道教神仙人物故事的也不少。除散见于“三言二拍”中的若干短篇之外，长篇以道士陆西星所作《封神演义》（一说为许仲琳所作）为最著。道教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反映在题材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文体上。如《步虚词》这种文体的来源，据《异苑》的记载，乃曹植游山，忽闻空中诵经声，清远道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文学家和道教学者又根据步虚声，进而作《步虚词》。唐吴兢《乐府古题解》谓：“《步虚词》，道家曲也，备言众

仙缥缈轻举之类。”道士斋壇赞颂时，常以道家法曲腔调，讽颂步虚词。还有一种文体叫“青词”，亦称“绿章”，这种文体为道教举行斋醮时，呈给天神的奏章表文，用青藤纸书朱字，故谓之“青词”。明世宗时，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等，皆先后以青词得宠，卒至入阁，以至有“青词宰相”之义。此外，道教对中国音乐、书画、雕塑、石刻、建筑等形式及其精神，均有重要影响。例如，道教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倾向就有重大影响，为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领域来看，道教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道教为了实现其长生成仙的理想，从其开创时起，便十分重视修炼方术，试图通过各种方术，来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科学技术的有关领域积累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材料，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丹鼎派的道士们，为了炼制出长生不死之药，积极从事炼丹活动，对各种丹术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为近代实验化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它是近代实验化学的前驱。汉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借《易》道以明丹道，其中便含丰富的科学思想，为我国古代化学、气功学、养生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有关于物种变化的一些论述，还具体介绍了许多炼丹的方法，对化学和生物学都有极为重要的贡献。许多道教学者往往兼攻药物学和医学，葛洪就明确地指出，为道者必须“兼修医学”，他和陶弘景等人都撰有医学专著。唐代道教学者孙思邈，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道教的养生术与预防医学紧密结合，作为却病延年的重

要手段，在道书中的论述颇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导引、行气、服食、房中、按摩、居处、养性等等许多方面，其中包含合理因素。总之，道教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有它的独特作用，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科学技术方面的宝贵遗产，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

第四，从政治领域来看，道教的社会影响就更为广泛。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方面是上层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服务，因而长期以来，道教均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不少道教徒直接参与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权夺位出谋划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的道教徒虽“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甚至还有“山中宰相”之称；有的以“终南”为仕途之捷径，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出入宫廷，辅佐王政。道教遂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支柱之一。另一方面，许多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也曾利用道教作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并利用道教经典中的某些思想作为他们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甚至还建立了地方政权。汉末的黄巾起义，就利用了道教。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在汉中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了巴、汉一带将近三十年。西晋时李雄在成都地区所建立的成汉政权，历经六世四十七年（公元301年至347年），主要也是靠天师道的支持。这个政权在天师首领范长生的辅佐下，刑政宽和，事役稀少，甚得人民的拥护，“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晋书》卷121）由此可见，道教与过去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五，从道德伦理的领域来看，道教所产生的社会

影响也很突出。道教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的宗教，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劝善书，包括功过格等，其中包含了许多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合理的伦理道德思想，这些内容不仅对道教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它的各种劝善书，在社会上流传很广，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士大夫也对它赞不绝口，为之作注者难计其数。其影响不可低估。

第六，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这些领域来看，道教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首先，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历史上许多道教徒为了得道求仙，自觉抛弃人世间的一切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甘于恬淡素朴的生活，安贫乐道，刻苦磨炼，主动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这种传统，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宗教形式，长期传播于社会，对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起了重大作用。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隐士”风范的人物，莫不以安贫乐道、唯道是求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们立身行事，本着“是道则进，非道则退”的原则，“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视富贵如浮云。他们的言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社会风气。其次，道教是以长生成仙为其最终目的，因此，它竭力倡导重生、贵生、热爱现实的人生。葛洪在确信人的寿命长短，不是上天所决定的，人们通过修炼可以达到长生不死，“我命在我不在天”。《抱朴子内篇》卷十八《黄白》篇引《老子西升经》亦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道藏》第11册第506页）鼓励人们积极征服自然，努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思想经过道教的长

期宣传，深入人心，不能不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使人定胜天的信念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再次，道教还奉行《道德经》里“知常容，容乃公”（《道德经》第十六章）的准则，主张宽容、谦让、虚怀若谷，反对自矜、自足、自大、自伐，反对骄傲自满，集中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兼收并蓄态度，融摄百家，像海纳百川一样，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没有儒家那种视自己为正统、别人为异端邪说的排他性。这种文化心理的发扬，形成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胸怀，容易吸收各种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能够经久不衰，而且愈来愈繁荣昌盛。

除以上所讲六个领域之外，道教对民间的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也有重要的影响，如崇拜三官、灶神、城隍神、土地神、财神、雷神、八仙、妈祖等，都和道教有密切关系，这里就不再详细地讲了。

懂得了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在道教的道理，也就不难明白了。